



WWW.SRASS.ORG.CN



首页	时政	学术	人文	国内	海外	微博说	成果	新书推荐	往期报纸	联系我们
--------------------	--------------------	--------------------	--------------------	--------------------	--------------------	---------------------	--------------------	----------------------	----------------------	----------------------

公告栏

搜索



[首页](#) > [理论](#) > [列表](#) > [正文](#)

富强与公正是公众一贯的诉求

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赵修义



“富强”与“公正”的诉求是以一以贯之的。它是中国公众的稳定的长期的价值追求，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也有现实的基础。正是这种诉求推进着中国社会。

公众的情绪、公众的需要和公众的真实的利益是经常变动的，但是其中也有一以贯之的东西，这就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价值追求。在我们理论话语中，一段时期里，对于公众处境及其在一定的处境下提出的诉求，比较侧重的是“利益”（物质利益）二字。近年来的一个进步就是开始关注“价值”，价值追求或价值取向。如果从价值追求和价值取向的视角去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众的一以贯之的诉求，就是富强与公正。尽管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面，具体的内涵也会有所变化。

“富民强国”是中国人的强烈追求

改革开放初期，人民群众中迸发出来的最突出的价值追求就是“富民强国”，这本来就是中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强烈的追求。民主革命的胜利为此奠定了基础，但是后来的曲折使得这一追求受到了压抑。因此，拨乱反正，重新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全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就极大地调动了上上下下的积极性，开始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局面。不仅如此，在如何处理“富民”和“强国”的关系上，决策层及时回应了千千万万的民众十分强烈摆脱普遍贫困的诉求，开始把“民富”当作一个合法的值得追求的目标确立起来，于是就带来了勃勃生机，一时间“致富”、“奔小康”成为社会的风尚。许多新的经济形态，就是在这样的价值追求的驱动下破土而出的。

但是如果再往深里看，那就不难发现，“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回应了公众中长期存在的对于公正的诉求。具体地说，首先是对以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为名，从根本上否定按劳分配，否定八级工资制等所带来的“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分配方式所蕴含的分配不公的强烈不满。其次，对于取消高考制度，采用按照家庭出身、政治表现、与上司的关系进行选拔的办法来录取学生的不公正制度的不满。此外，还有对于农民的生产和经营活动自主权的种种限制的不满。在“文革”期间，这种诉求往往是采取怠工等消极对抗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拨乱反正”的许多举措都是回应了这样的诉求，一下子把公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思想解放之后，环境开始趋向于宽松，这种诉求就开始采用在行动上尝试突破的方式进行。于是包产到户，个体经营，长途贩运，乡镇企业等许多新的事物就在民众对于个人致富和公正的追求的推动下，突破了原有体制的限制破土而出，并经过反反复复的较量，逐步取得了合法的地位。这就是改革开放初期的状况。

市场方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启动之后，公众对于个人致富的诉求事实上得到了肯定。“致富光荣”、“发展才是硬道理”



社科报的微博

上海, 卢湾

关注: 426 粉丝: 1053 微

社科报

【梦鸽庭审后曾对儿子哭喊：妈妈绝对师透露，梦鸽庭审后曾哭着对儿子喊妈妈绝不放弃你。”如今，在这场“事件中，梦鸽已经“抢镜”其子成了上，她被人揶揄为“中国好妈妈”，是她害得儿子被送上了审判席…（新 <http://t.cn/z8xZYai>(13-9-5 15:...

东方微博 [登录](#) | [注册](#) | [随便看看](#)

成果撷英

[更多](#)

- 华东师大推荐——程华平：书写
- 刘建军：欧洲中世纪文学是再造
- 陈洪捷：博士教育质量研究
- 研究中国农业的时空历程
- 南京师范大学推荐——俞良早：

学术看台

[更多](#)

- 1376期 媒体聚焦
- 1375期 学术看台
- 1374期 学术看台
- 1373期 学术看台
- 1372期 学术看台
- 1371期 媒体聚焦
- 1370期 学术看台
- 1369期 学术看台
- 1368期 学术看台

的口号传遍中国大地。提升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成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价值追求，从而迎来了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

追求效率不能自动解决公正问题

那么，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是否还有意义呢？在公众中是不是还有吸引力呢？情况应该说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就高层来说，始终把实现“共同致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价值目标。邓小平在开启市场改革大潮的南方讲话中对此的论述是大家所熟知的。

但是实际生活与公共舆论的变化却走向了一种极端。对于经济利益和经济发展的追求似乎成为压倒一切的价值目标。在主流话语中，“公平正义”的地位日渐式微。“效率优先”成为一种压倒性的观念，甚至一度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解读为“效率唯一”。这种情况的出现，有非常复杂的原因。

一方面，市场改革的启动，把人们的经济动机解放出来，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利益冲动，而各地当政者大多把经济增长作为压倒一切的目标；另一方面，无论是学界政界还是相当一部分公众对于市场寄予很高的期望，将公正的诉求寄托于市场。由于在转向市场体制的过程中，公众的活动空间大为扩展，经济活动的自由度大为增加，不断地冲破计划经济时代加在人们身上的许多限制，公正诉求的一部分，如机会的公平、个人权利的实现等比以往得到更大程度的满足。诸如对于农民的居住与工作自由的限制，被市场经济的大潮冲破，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并在城市中寻得改善自己生活状况的机会；地域之间人口流动的机会冲破了原有的户籍制度，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等等。这就使得很多人在一段时间里误以为，市场本身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就可以自动地解决公正问题。

新自由主义不能成为主流

这种错觉为一段时间里大幅度地引进的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所强化。在市场改革的初期，我们对于市场的认识以及市场中进行经济运作的机制和方式知之甚少，于是把眼光转向发达国家的经济学说。而这段时期在西方成为主流的是新自由主义。于是新自由主义不仅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流、中国经济思潮的主流，甚至成为整个社会思潮的主流。这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本身就带有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特征。自由主义经济学不仅应该成为显学，而且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假定（如“经济人”假设）可以用来解释所有的社会政治问题，甚至被认为可以解释动物的行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的学界和思想界，最受重视的是新自由主义中的一些极端的学派，哈耶克就成为备受推崇的思想家。按照这种学说，自由市场的自发的调节功能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经济公正”、“分配正义”、“平等”等本身就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在他们看来，如果说公正的话，那就是一个保护私有财产权和交易的公平的问题，此外别无意义。至于市场中产生的贫富分化，他们用所谓的涓滴经济学来解释。这种学说，也可简称为“高山流水”原则，即强调只要富人的财富增加，会自然而然地流向下层。

易于被忽视的是，西方当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是从属于政治上的新保守主义的。新保守主义在政治上的特点是偏爱贵族制和等级制。作为美国新保守主义的精神导师列奥·斯特劳斯就是一个代表，尽管他们积极地向世界各国推行民主自由，但是在骨子里是敌视“平等”原则的，其倡导的是一种精英主义而漠视广大公众尤其是底层的公众的利益和关切。

当我们融入全球市场，学习市场经济的时候，一大批的智囊人物就把这种观念搬到了中国，对学界和决策层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种观念就是所谓的“三个依靠”论，即认为要发展就是“依靠资本而不是依靠劳动，依靠精英而不是依靠大众，依靠强势而不依靠弱勢”。尽管直接见诸文字的不多，但是拐弯抹角地加以论证的并不少见。比如反反复复地强调财富是富人创造的，是知识精英创造的，好像大众的劳动本身在今天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在实际生活中若去仔细观察的话，许多具体的作为（如城市管理中强行驱赶小商贩），许多挂在墙上的标语（如“成功引资者是功臣，破坏引资者是罪人”），都体现着这样的观念。

此类观念的盛行，在中国社会是有其内在根源的。其中之一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功利主义的思维模式。以前是政治的功利主义，转向市场经济之后，就是经济的功利主义。具体的表现就是增长主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GDP主义。此外就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非常深厚的“贫富贵贱”等级观念。这些观念在市场经济下发酵，于是公平正义、平等权利等的观念就淡出主流话语。一时间，一些学界、商界和政界的精英到处张扬这种观念，占领了大量的公共舆论。舆论对于权贵、富豪、精英的赞扬无处不在，仅从广告、商品的品牌和许多住宅区的命名就可以让人感受到一股“以富为荣，以贵为荣、以奢为荣”的风气在四处弥漫，即当年荀子所说的“势荣”压倒了的“义荣”。

一方面是实际生活中的两极分化，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没能得到遏制；另一方面在舆论上的观念上“公平正义”的淡出。这就是一段时期里，中国社会呈现给我们的状况。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公众中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就不复存在。相反，深藏于民众内心的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在市场经济中不断地表现出来。起初，大量的是通过行动而不是通过话语来表达的。比如，农民的迁移和流动，就是不断地在冲破身份的限制，而寻求公平机会的一种自发的力量。对于结果的不公平，事实上的城乡、贫富之间的巨大差异，也有各种不同的方式的抗议（包括一些消极的甚至是破坏性的行为中所透露出来的）。只不过没有直接用“公平正义”这样一类话语表达

出来而已。

“权利意识”正在觉醒

进入21世纪之后，这种诉求就日渐集中地表达出来了。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及时回应了公众的公正诉求，一步一步地把实现公平正义放到了一个突出的位置上。由于一系列集中解决社会公正问题的政策的出台，舆论氛围也开始变化，“公正”这一价值观念在主流话语中日渐获得了重要的地位。对于“公正”这一价值目标的阐释和理解也日渐深化，其中的一个新特点，就是“权利意识”的觉醒。一方面人们的关注已经不再泛泛地停留于利益或者是收益上，而是关注于公民有资格诉求的“权利”。另一方面，人们不再消极地等待自上而下的利益恩赐，而是开始思考什么是自己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有资格自主地诉求的权利和利益。于是各式各样的维权活动在各个层次上展开。而且与西方的演变不同，没有经历从消极权利到积极权利的明显的阶段，而是一下子，把许多的权利诉求一起提上了日程。对于此类的维权行为，在一段时间里，人们还没有从“权利意识”这一视角去加以把握，许多舆论还是认为这仅仅是利益关系的不平衡，或者是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也有的舆论则单纯侧重于从社会稳定的角度去观察和处理问题。这在实践中带来了许多问题，促使人们意识到已经觉醒了公众的权利诉求是不可忽视的。

通过对三十多年来的历史进程的回顾，可以看出，“富强”与“公正”的诉求是一以贯之的。它是中国公众的稳定的长期的价值追求，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也有现实的基础。正是这种诉求推进着中国社会。热衷于增长主义的观察家，不要轻视中国公众的公正诉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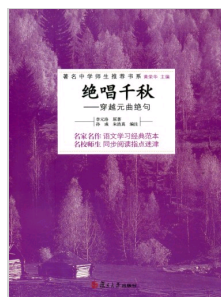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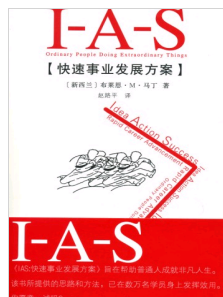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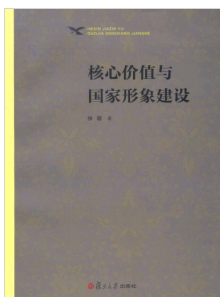
■ 言论

潘世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处于一种还没有到定型阶段的发展状态。有两种形式的教条主义，一种是将自己正在形成的东西凝固下来，另一种就是把外来的东西视为揭示中国现实的某种标准。我们在思考问题和研究问题方法上，存在一个自主性的问题，即是立足于中国的实践，立足中国的现实，还是用别人的评判体系作为自己行动思考的依据，这是一个大问题。中央讲“三个自信”，实际上隐含着的就是确立中国的自主性。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习惯于把自己看成一个客体，看成普适理念的一个对象，看成人家界定的很多理念的再次实验的对象。我们要解决的是自主性的问题，这个自主不是妄自尊大，不是脱离整个世界。我们要在这些问题上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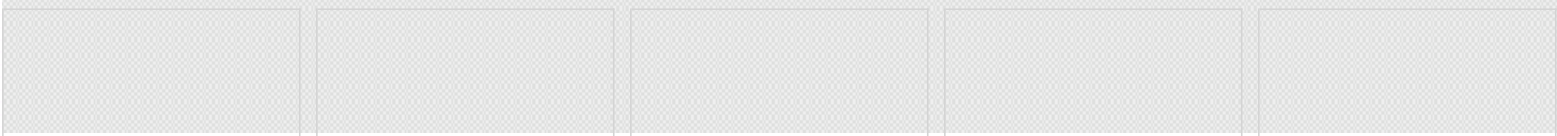
蓝蔚青（浙江省社科联副主席）：凝聚共识的背后还是要调整社会的利益关系，因为分歧的背后是利益。造成认识严重分歧的原因往往是有些政策损害了一些群体的利益。所以参与或进行顶层设计一定要合理调整和解决利益分歧，突破部门局限，为社会提供理论指导和支撑，变空谈为实干。有人说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我们要为社会提供风向标。

许宝友（中央编译局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改革到目前这种状况，还能不能像小平同志主张的不争论解决问题？之所以提出顶层设计，是因为问题太多了，且方向不定，因为各有各的说法，利益已经分化了，涉及到利益的重新分割和分配，这里面有一个怎么样平衡的问题，所以这时候需要站在一个高度做一个顶层设计，为改革明确方向，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应当追求的价值，怎么样体现这一价值追求，应当是我们下一步改革的共识，是下一步改革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公平正义需要我们倡导，既然是共产党，既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有一个主导的价值观或理念，公平正义或许可以作为主导的价值理念。（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成立20周年暨“改革再出发凝聚成共识”高层研讨会支持）（第1363期 第3版）

新书推荐



往期报纸





合作媒体

中国新闻监督网
师范大学社科处

上海社会科学院
北京大学社科部

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
上海财经大学

南京大学社科处
浙江大学求是新闻网

华东师范大学社科处
上海博物馆

南京师范大学社科处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
北师大新闻网

| 报社动态 | 人员概况 | 投稿方式 | 招聘信息 | 广告业务 | 联系我们 |



Tel. + 86 - 21 - 59575000 59568566 59568200
网站内容归上海社会科学院版权所有 沪ICP备
05018181号



沪ICP备05042248